

浅析汉服运动兴起的原因

張 小 月

摘要

对于汉服运动兴起的原因，不少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然而大多都将原因总结得较为单一，并且一般都集中在“民族主义”。而笔者认为，当代汉服运动的兴起含有“潜在因素”与“导火索”两类因素，它们共同构成汉服运动兴起的原因。其中，潜在因素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汉服运动实践者的个人因素，也就是内在动力，另一类是社会环境因素，是社会大背景。

关键词：汉服运动、民族服饰、身份认同

Many scholars have put forward their own opinions on the reasons for the rise of the Hanfu movement, but most of them summarize the reasons singularly and generally focus on "nationalism". But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rise of the contemporary Hanfu movement contains two kinds of factors, namely "potential factors" and "fuse", which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reasons for the rise of the Hanfu movement. Among them, the potential factors can also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one is the personal factors of the practitioners of Chinese costume sport, that is the internal motivation, the other is the soci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which is the social background.

Keyword: Hanfu movement, national costume, identity

一、汉服及汉服的消亡

“汉服”这个词，目前在字典里还未被收录，是汉服运动实践者创造出的新词。虽然“汉服”这个概念至今仍在被外界质疑，然而根据实践者所表达的意思来看，“汉服”意为“汉族服饰”，是指由汉人所发明且长期穿着的，带有明显汉族文化风格的服饰，大体上具有平面剪裁、交领右衽或对襟、宽袍大袖、无扣结缨、飘逸、大气、端庄等特征，且对日韩等周边国家服饰有着深远影响。

在汉服运动的言论中，一般认为汉服最终消亡于清代。其大致原委是1644年满族建立清政府，为了同化汉人，巩固政权等原因，于第二年发布“剃发令”，令全国男性官僚百姓于10天内剃发，效仿满人男性发型，以表归顺朝廷。继而又发布了“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著薙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的易服令，两部法令统称为“剃发易服”。¹汉族一贯将“礼仪”视为“华夷之辨”，即“文明与野蛮”的判断标准，衣冠之礼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尤其是衣装中的“右衽”特征，是区别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一项基准。另外，汉人受儒家文化教诲深刻，《孝经》中有云：“身体发肤，授之父母，不敢损伤，孝之始也”，这也是当时汉人的基本伦理，剃发被视为是对父母的大不敬之罪。因此，剃发易服遭到了汉人三十七年的抵抗，而清政府则陆续发起了“江阴八十一日”、“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残酷的屠杀镇压。从各类史料上来看，剃发易服的屠杀的确惨烈，例如清代韩葵在《江阴城守纪》中的描述：“次日，犹巷战不已，清兵用火攻败之。四民骈首就死，咸以先死为幸，无一人顺从者。下令从东门出者不禁，又下令十三岁以下童子不杀，男女老少赴水、蹈火、自刎、投缳者不能悉记。内外城河、泮河、孙郎中池、玉带河、涌塔菴河、里教场河处处填满，叠尸数重，投四眼井者二百余人。”以及“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午后，出榜安民。城中所存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隐蔽处及僧印白等，

1 参阅王一伶：《略论清初剃发易服令》，《沧桑》，2012年05期

共计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日，城内死者九万七千余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余人。”²等。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汉服并非消亡于清代，因为据清代天暇所著的《满清外史》记载，剃发易服在民间遭到强烈抵抗后，清政府继而施行了“十从十不从”的缓和政策，即“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隶不从；老从少不从；儒从而释道不从；娼从而优伶不从；仕宦从婚姻不从；国号从官号不从；役税从文字语言不从”。³因此，他们认为，汉服运动所谓的“汉服”实际上一直得以延续，直到近代自然消亡，而并非因“剃发易服”。然而，“十从十不从”的缓和政策也遭到许多质疑。其一是作为一项能在“暴政”后缓和民族冲突，树立清政府正面形象的政策，正史中却并无记载；其二是若将其内容仔细比对，可以发现存在着一些矛盾与不合理的地方，例如“男从女不从”与“娼从而优伶不从”，前者已说明“女可不从”，而后者中又指出“娼妓必须从”，再如“十从十不从”是针对“剃发”与“易服”而言的，但后两条“国号从官号不从”与“役税从文字语言不从”则与“发”、“服”无任何关联，被纳入条中实为牵强。然而，就清初女子服饰，以及当代部分儿童的襁褓、宗教服饰、丧礼服饰的确保留了汉服基本样式特征来看，“十从十不从”也并不能说是完全捏造的。但笔者认为，无论如何，汉族的衣冠制度是一个体系，“剃发易服”摧毁的是一个整体，因此并不能说因为体系中的某个部分还得以延续，就认为该体系并无消亡。况且，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阶级社会，成年男子的服饰才是一个国家衣冠体系的根本，男子服饰一旦遭到易服，必定会波及到女性服饰，使其在潜移默化中被同化。

汉服运动将汉服的消亡归结于满清政府的剃发易服政策，就很容易导致汉服运动的实践者在对社会宣传汉服时会涉及到这段历史，在有关汉服运动的讨论中，满清政府的一系列镇压屠杀也经常被汉服运动的实践者用来诉说有关汉服的历史悲情，以便重寻失落之“美”，⁴甚至会引发一些偏激的民族

2 资料来源于“Chinese Text Project”: ctext.org/wiki.pl?if=en&chapter=442179&remap=gb

3 参阅杨蓓：《“十从十不从”中的清代服饰制度考究》，《兰台世界》，2014年35期

4 参阅周星：《汉服之“美”的建构实践与再生产》，《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矛盾言论,从而被社会及部分学者批评为因“民族主义”而兴起的社会运动。关于汉服运动是否因“民族主义”而起,对此笔者倾向于持否定态度。不可否认,汉服运动中的确有民族主义者借助汉服运动大肆宣扬民族仇恨,挑起民族矛盾,充满了危险性,但这并不能说是汉服运动的主流与动机。

二、先人的“汉服运动”

有汉服运动的实践者认为,汉服在当代的复兴是必然的,其理由是自清初“剃发易服”政策实施起至清末民初间,一直都存在着秘密反抗“剃发易服”以及企图复兴汉服的汉人,甚至在民国初期还爆发了一场小型的“汉服运动”。如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他曾有意向日本借兵反清,无果后虽回国归顺清政府接受剃发易服,但余生创作《深衣考》一书,用文字传承汉服,该著作在民国时期被发现;⁵清末民主革命家章太炎被认为是近代第一位复兴汉服的人,章太炎反清意识浓厚,为推翻清政府做出许多贡献。1902年,他因反清被追捕,流亡日本,在日本期间,他请日本友人缝制了交领的衣服,并绣上了两个“汉”字,此衣现收藏于故居。章太炎在《甲寅五月二十三日家书》中对此衣中刺“汉”字有这样的描述:“斯衣制于日本……日本衣皆有员规标章,遂标汉字”,并视这件衣服为珍宝——“吾虽陨毙,魂魄当在斯衣”⁶。虽然这件衣究竟是汉服还是和服,还存在许多争议,但章太炎家族历代要求深衣殓却是事实——“吾家入清已七八世,殆,皆用深衣殓,吾虽得职事官,未尝诣吏部,吾即死,不敢违家教,无加清时章服。”可见,即使这件衣服是和服,但对于章太炎来说,交领特色的衣服,贵于满清服饰。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曾有一场小型的“汉服运动”,如画家张大千、思想家钱玄同都曾穿着过汉服;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毕业照中也出现过着汉服的学生;1914年,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穿着北洋政府制定的《祭祀冠服图》和《祭祀冠服制》中所规定的汉服深衣礼服出席祭典。因此,部分汉

学版)》,2012年02期

5 参阅杨娜:《汉服归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第19页

6 参阅章太炎的家书《甲寅五月二十三日家书》

服运动的实践者认为，当代的汉服运动是先人反抗“剃发易服”的延续。

然而，虽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驱除了鞑虏恢复了中华⁷，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很快民国政府便又提出了“五族共和”的少数民族政策。同时民国也是一个西学东渐，革新思想的时期，科举制度的废除，西式大学的建立，“民主”、“科学”的提倡，无不是与中国旧礼制相对抗的。加之1919年4月5日起爆发的以“反帝反封建”为目的五四运动，以“反传统”、“反孔教”为目的的新文化运动，都将“封建礼教”的批判推向高潮。讽刺的是，曾经推广汉服的钱学榘，也正是这两场运动的推动者之一。不难看出，民初的“汉服运动”是针对异族满清政府的运动，可以说是因满汉对立而起。然而，随着满清政府倒台，势力逐渐减退，以及中西方实力的悬殊，“五族共和”的倡导等，中国社会的矛盾很快便从民族矛盾转变为“旧文化”与“新文化”的对立。因此，作为古代礼教之一的“华夏衣冠”，也理所当然地失去了复兴的土壤，民国小型的“汉服运动”也只是昙花一现。

综上所述，无论是清代人对剃发易服的反抗，还是民国初年的“汉服运动”，皆是围绕民族矛盾而展开的，这断然与当代的汉服运动截然不同，因此，说当代汉服运动是先人复兴汉服的延续显然并不太合理。当代汉服运动的兴起，有着新的社会土壤与意义。

三、当代汉服运动兴起的内在动力

笔者认为，在分析汉服运动兴起原因时，不应只着眼于汉服运动兴起时的种种迹象，以及兴起后的各种言说，更应该关注那些汉服运动的实践者在汉服运动前的状态。实际上，在汉服运动的实践者知晓“汉服”前，就早已萌发出倾心于汉服这种风格服饰的潜在情感，成为推动汉服运动的潜在能量，这是汉服运动兴起的主观动因，也是汉服运动的实践者愿意推动汉服运动的个人因素。

较为典型的例子为较多的汉服运动的实践者都曾有过披床单、毛毯等扮

7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的口号

演古装剧角色的经历，可见，他们原本就喜爱这种宽袍博袖、长衣飘飘的形象。虽然汉服运动的实践者极力将“汉服”与“古装”划清界限，但不可否认，大部分实践者，尤其是早期的实践者，对汉服的最初认知，都来源于“古装剧”中的“古装”，例如11岁移居澳大利亚的华人王育良，在谈到中国人的形象时曾表示：“那时候看了一些古装剧，再加上儿时对于‘西游记’中镇元大仙的印象，一直以为中国人的样子就应该是宽袍大袖，衣袂飘飘才对。”⁸而他本人也曾经披被单模仿过电视剧中的古人，陶醉在端庄大方的气质中。⁹《汉服归来》的杨娜在谈及自己初识汉服时也是这样写道“汉服——原来它曾经被称作‘古装’，它就是我苦苦找寻了十余年的民族服装啊。”¹⁰对古代服饰怀有浪漫主义情节的人，很容易接受汉服作为自己的民族服饰，并更加积极地参与汉服运动。在汉服运动的复兴实践中，也的确存有不少“角色扮演”的倾向，以及早期汉服运动的实践者将“戏服”视为汉服的现象，例如当代第一位穿“汉服”上街的郑州市民王乐天，当时所穿着的“汉服”就是电视剧《大汉天子》李勇的服装样式改造的。¹¹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对于他们来讲，汉服如能复兴，就是对古装扮演的这场“由床单、毛毯转变为实实在在的服装”的道具升级。

与因“古装”而喜欢汉服较为相似的是，部分实践者会因热衷于和服或韩服而喜欢上汉服。虽然他们会被认为是“哈日族”或“哈韩族”，然而众所周知，日韩服饰皆是由汉族服饰发展而来，虽其具有日韩本民族的风格，却同时保有着汉服的基本特征——平面剪裁、褒衣大袖、直领系带等等因此，这三种服饰的美在某些方面是互通的。对此，周星在《汉服之“美”的建构实践与再生产》中也指出过：“汉服爱好者们对于日本和服之美、韩国韩服之美通常均是认可的，有时甚至不无羡慕。”¹²可以说，对于这部分实践者来

8 王育良口述 参阅杨娜：《汉服归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第33页

9 王育良《天地衣裳 全六期配图》（未公开）参阅杨娜：《汉服归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第33页

10 杨娜：《汉服归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第328页

11 参阅史伟、董毅然：《我们为什么加入汉服运动》，《北京科技报》，2005-07-25

12 周星：《汉服之“美”的建构实践与再生产》，《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02期

讲，如果汉服能够复兴，就等同于可以实现他们从“羡慕他人”到“自己拥有”的一个转变。

还有一类较为典型的个人因素，主要体现在部分女性实践者身上。自民国起，旗袍一向被视为华人女性的传统服饰，也是许多中国女性出席国际或其它重要场合的首选礼服。然而，旗袍样式性感，主要通过身体表现来突显女性的美，对女性身材要求颇高，因此，那些身材不佳或性格内敛的女性，由于羞于表现身材而始终未有勇气在国际或重要场合展现她们穿着民族服饰的形象，那么，通过包裹遮掩身体来突显女性含蓄之美的汉服，也就理所当然地会成为她们力推的民族服饰。

另外，汉服运动的实践者，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热爱古典文化，或是对古典意境、古代社会抱有浪漫的憧憬与幻想。因此汉服运动也聚集了历史、古典文学、诗词歌赋、古代书画、传统乐器等诸多领域的传统文化爱好者。英国华人唐迪穿着汉服参加2012年02月09日播出的中国人气相亲类节目《非诚勿扰》，在谈到择偶条件时表示，希望自己的另一半，是要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喜欢汉服，并且可以支持自己复兴汉服的。并且他还强调，自己的婚礼，一定不会是婚纱与西装，而是穿着汉服，举行汉族式的周制婚礼。他的这一番话，感动了当场的一位女嘉宾，她说自己也关注汉网，也喜欢汉服，她认为他很有才华，并希望可以和他一起牵手，女嘉宾甚至边说边哭泣。¹³2015年7月4号，也有一位叫李治的男嘉宾身穿汉服参加节目。他也同样表示，自己喜欢传统文化，并希望自己的另一半具有古典美。¹⁴再如著名作词家方文山，早在汉服运动前就已经写过许多古典型歌词，且配上歌手周杰伦的古风曲，一度在华语流行乐坛上刮起一场“中国风”。如今，方文山可以说是推动汉服运动最为积极的名人。喜欢古典文化、意境的人，对于汉服的认可度相对而言较高，因为“汉服”很大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他们建构“古典式”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在汉服运动中不乏有实践者将汉服穿入日常，以及汉服运动的实践活动通常都离不开古典艺能表演等现象中可以看

13 相亲类综艺节目《非诚勿扰》120219期

14 相亲类综艺节目《非诚勿扰》120704期

出。

四、汉服运动兴起的外在助因

除了汉服运动实践者的内在动因，有一个良好的社会大背景作为助因也是不可或缺的，这是汉服运动能够兴起的社环境因素。民国时期的小型汉服运动，正是缺少这样的社会土壤才瞬间即逝。

首先，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是汉服运动兴起的不可或缺的大背景。自古服装使用的自由度往往都会受到各方面的制约，汉服因“剃发易服”政策在清初逐渐消亡，清政府被推翻后也因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反传统”中的社会环境而不得复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衣装的着用往往包含了政治象征，因此大幅度受到限制，中国进入了一个“制服社会”¹⁵，人人穿着清一色的服饰。直到改革开放后，人们对服装的使用才获得了空前的自由，汉服才有可能被再发现，再兴起。与此同时，富足的物质生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可以说，对民族服饰的思考，以及穿着美丽的民族服饰的欲望，是一种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97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为5188.5元，被视为“汉服运动元年”的2003年则达到了9061.2元，2012年为26959.0元¹⁶，可想而知，那个对服装提倡“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年代，这种追求是极为奢侈的，也是大多百姓无暇顾及的。

其次，也许是对过去“反传统”的反击，当下中国国内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礼赞传统，抢救、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的风潮。¹⁷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与国外的频繁交流中的比较，使得中国人越发产生一种对自我文化的丧失感，例如每当看到日本人的和服、正坐、礼仪以及传统节日，都会不禁感叹那些中国人也曾经拥有，我们却没有保护好，让这些文化失传了。而2005年，韩国将“端午节”申遗成功一事，更是将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

¹⁵ 参阅周星：《“生活革命”与中国民俗学的方向》，《民俗研究》，2017年第1期

¹⁶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

¹⁷ 参阅周星：《生活革命、乡愁与中国民俗学》，《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2期

推到了高潮，一部分人埋怨国人不重视传统，使得文化被人夺走，另一部分人则直接谴责韩国方面“偷窃”文化的行为。虽然最后得以证实，韩国申遗的“端午节”虽是起源于中国，但发展至今除了名字相同之外，已无直接关系。然而在被激起的传统文化保护的热潮下，中国政府最终于2007年决定，从2008年起将“清明节”“端午节”“重阳节”列为法定假日。因此在笔者看来，当代汉服运动与其说是先人抵抗“剃发易服”的延续，倒不如说是新兴于21世纪初的这股传统文化复兴浪潮中的一支队伍。

最后，网络与媒体时代可谓是当代汉服运动兴起及迅猛壮大发展的重要背景之一。

关于网络，周星在论文《汉服运动：中国互联网时代的亚文化》中，将“‘汉服运动’置于当前中国社会互联网日益普及的这一时代背景之下予以分析”。¹⁸并同时指出“为什么辛亥革命时期曾经的‘汉服’动向不成气候，而在完全没有‘易服’之社会政治需求的如今，‘汉服运动’却如火如荼？答案就在互联网。”¹⁹当代汉服运动，也的确是最初兴起于网络，继而从“线上”转战“线下”，当然，即便是“线下”活动，也大多是在“线上”发起的。根据杨娜对汉服运动网站论坛等兴起的梳理可知，2002年起，有许多网友开始在各大中国知名网站上开辟论坛版块，2002年7月，网友“中军元帅”建立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论坛。2003年，以网友“步云”为首，建立了第二个独立的网络平台——“汉知会”，后正式注册地域名，并改名为“汉网论坛”。该网站引了一些零散活跃与其他论坛的网友，并在这里发表思想类的原创性文章，多次募集，组建志愿性质的宣传组，对汉服进行形制考据与历史资料汇总，为汉服的兴起和传播搭建了交流平台，为后期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支持，被认为是汉服运动的发源地。²⁰如今，“百度汉服吧”、“兴汉网”、“天汉网”、“汉未央”、“汉文化论坛”、“华夏复兴网”、“华夏汉网”等有关汉服的网站、论

18 周星：《汉服运动：中国互联网时代的亚文化》，<http://iccs.aichi-u.ac.jp/archives/report/040/509c86707fb8e.pdf>

19 周星：《汉服运动：中国互联网时代的亚文化》，<http://iccs.aichi-u.ac.jp/archives/report/040/509c86707fb8e.pdf>

20 参阅杨娜：《汉服归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第30页

坛相继兴起，其中以“百度汉服贴吧”较为热门，截止至2018年11月，关注用户已达92万人，累计发帖量1358万。汉服运动的实践者通过这些网络平台组建各种“汉服社”，汉服社不定期举办各种线下汉服活动，通过这样的活动对社会宣传汉服，而活动的募集，也是通过网络平台发布的。例如笔者于2018年8月17日对“无锡花韵汉风文化社”的七夕活动的田野调查，最初就是在“百度无锡汉服吧”获得的信息。在当天的调查中，笔者还发现了一个汉服运动的“互联网特征”，就是参加活动的实践者，即便在线下，也相互使用网名进行称呼。

媒体时代对汉服运动，主要是能够给不常上网的一般市民提供展示汉服的 platform。新加坡记着张从兴，一直都关心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自2003年上半年起就一直关注汉网，看到王乐天的照片后，便写了一篇名为《阔别三百余载，汉服重现神舟—访当代汉服第一人王乐天》的报道，刊登在2003年11月29日的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并由联合早报网的传播，带动了中国境内媒体的跟进报道，汉服运动被扩大为公共事件，张从兴成为第一位报道汉服的记者，而《联合早报》也成为了全世界第一份报道汉服复兴的报纸。²¹除了新闻报纸的报道外，汉服运动的实践者也会借助参加综艺节目推广汉服，如上述穿着汉服参加《非诚勿扰》的英国华人唐迪，虽然参加的是相亲节目，但在节目中，他不断向大家介绍汉服是什么，有宣传汉服之意；汉服商家锦瑟工作室参加了2015年6月23日播出的《中国梦想秀》，并且展示了一套唐式婚礼。此外，方文山拍摄电影《听见下雨的声音》，通过将汉服融入电影的方式宣传汉服。在方文山的建议下，歌手周杰伦也将汉服拍进其歌曲《天涯过客》的MV中，试图通过周杰伦在中国乃至整个华人圈的影响力宣传汉服。

不难看出，无论是个人因素还是社会环境因素，都是汉服运动能够兴起的必不可少的大背景，这些潜在因素给汉服运动提供了兴起的可能性，等待导火索将其点燃。

21 参阅杨娜：《汉服归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第38-39页

五、汉服运动的导火索

汉服运动兴起的导火索，笔者将其概括为是汉族人通过“民族服饰”产生的身份焦虑。

自我国建立起56个民族的概念后，民族大团结的宣传也日益增多，周星曾指出：“在中国地各种多民族的场景下，尤其是在‘华化’和全球化的趋势中，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往往会通过‘民族服装’来予以表达，而建构本民族的鲜明‘形象’的主要途径之一，正是不断地重新定义和推出经过改良了得‘民族服装’。”²²尤其是在56个民族大集合的合照中，通常可以看到各民族的代表成员通过穿着本民族的民族服饰来表达自己的民族身份，而在此当中，汉族人往往没有特定的民族服饰，多是穿着日常休闲装，相比少数民族鲜明的民族形象，汉族显得十分没有“个性”。这便使很多人不禁开始思考：汉族的民族服饰是什么？汉族本来的形象是什么？这是汉族在多民族国家中对本民族民族形象产生的身份焦虑。

另一方面，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人在全球化进程中对本国国际形象产生的身份焦虑，这一点主要体现在2001年于上海举办的APCE会议中。APCE会议历来有在闭幕式时穿着举办国民族服饰的传统，而2001年上海APCE会议将“唐装”作为中国民族服饰展现给全世界，虽得到了众多好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争议。有人认为，唐装是新设计的时装，不符合一般认知中“民族服饰”、或者说是“传统服饰”应该具有“悠久性”的特征，民族服饰是有追溯性的，它不需要设计，因为它本身就存在。诚然，唐装的确是为此次会议精心设计的“中式服装”，然而该设计也并非空穴来风，它是以清代对襟马褂为基础，保留了立领、盘口以及传统图案纹样的特征的服饰。²³但也正因如此，有人指出，唐装实为根据满族服饰改良而成的服饰，而中国文化基本以汉族文明为代表是一个客观现状，且满族统治中国时期较短，无法

22 周星：《新唐装、汉服与汉服运动——二十一世纪初叶中国有关“民族服装”的新动态》，《开放时代》，2008（03），125-140页

23 周星：《新唐装、汉服与汉服运动——二十一世纪初叶中国有关“民族服装”的新动态》，《开放时代》，2008（03），125-140页

代表中国人5000年来的一贯形象。另外，对于“唐装”一词所产生的歧异，也引发不少对唐装的质疑——唐装是根据清朝的“马褂”设计而成，与真正的唐朝服装没有任何关系，也不属于中国的传统民族服装范畴。”²⁴对此，唐装的设计者也给予了回应：“此‘唐装’不是彼唐装，‘唐’字取自国外华人居住的‘唐人街’，它是根据‘唐人’穿的衣服而取名为‘唐装’的。”²⁵总之，“唐装”的问世引发出一系列的质疑，也引发一场关于“国服”之争的讨论。其中，网友“华夏血脉”于2002年2月14日在舰艇军事论坛上发表文章《失落的文明—汉族民族服饰》，这是当代第一次提出“汉族服饰”的一篇主体性文章，此文被转载到海内外多家网站和论坛上，两年内点击量近30万。²⁶

上海APCE中有关民族服装的问题，激发了潜在因素中主观动因的所有能量，并依靠社会助因使汉服运动迅速展开，由此成为了“汉服运动”的爆发点，在此后，各类有关汉族服饰探讨的网站论坛才如雨后春笋不断兴起。

六、小结

笔者认为，“剃发易服”的确是汉服消亡的直接原因，这一点无可厚非，然而，即便在满清政府推翻后，汉服也仍因国家变革等因素未使得被复兴，因此，清代汉人无法穿着汉服与当代汉人不穿着汉服，实际上是两种情境，先人的“汉服运动”与当代的汉服运动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当代汉服运动的兴起，是在十分复杂的环境下孕育而成的，除了必要的主观能动性外，社会大背景的助因也是不可或缺的成因。可以说，汉服运动既是当代人对传统赞美、追忆、保护的风潮中的一支，又是对服装表现、古装憧憬的浪漫主义，也是在国际、族际下对于自我认同的身份焦虑，亦是对长期反传统社会的一个反弹。同时，它也是中国网络媒体时代、民主时代、经济时代的产物，

24 月舞星城（网名）：《你认为汉族的民族服装有关是什么？》天涯论坛 2004-06-06

25 赵卉洲：《解读2001APCE的“唐装”文化》，中华网财经报道，2014-11-06

26 参阅杨娜：《汉服归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第28-29页

也反映着这个时代多样、富裕、包容等特征。

简单归纳来说，在汉服运动兴起前，就出现了部分喜欢“汉服”这种风格服饰的爱好者，他们正是日后汉服运动潜在的实践者。在民族交流、国际交流的刺激下，这些未来的实践者发现了这种服饰具备作为民族服饰的理由，并且一旦成为民族服饰，穿着它便有了正当性。同时，复兴民族服饰并非有主观动机就可以的，还需要倚仗各种社会条件、传播途径，而当代汉服运动具备了这些复兴的外部条件。

当然，汉服运动的兴起不能说其中完全没有“民族意识”，但在最初只能说是一种朴素的爱国或是爱族情怀，上升不到“民族主义”的强烈高度。民族意识是推动汉服运动的最强大的能量，但它是在与“他者”的对比与刺激中萌生而来的，在这之前，有汉服运动实践者个人的各种“小私心”，不容忽视。但这些都不及渲染民族情怀来得那么有力、正当，更不足以支撑一场社会运动。而“民族主义”，更多时候是汉服运动的实践者在无法清晰地向社会解释“什么是汉服”、“汉服消亡的原因”，等问题，以及被外界恶意批评、抹黑时的一种不成熟的激烈反应与情感宣泄，是汉服运动实践活动中产生的一种不成熟的负面情绪，因此笔者认为“民族主义”并不是汉服运动兴起的主要原因。

总之，没有“潜在因素”，就无法强烈地感受到“他者”的刺激，即便感受到了，也不存在复兴的土壤与传播途径，而没有“导火索”，汉服运动也始终只能处在酝酿阶段，无法一触即发。因此“潜在因素”与“导火索”相辅相成，共同导致汉服运动的兴起，缺一不可。

